

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及影响^{*}

——以《南洋商报》为中心的研究

徐文明 唐丽娟

(上海大学 上海电影学院, 上海 200072)

[关键词] 新加坡;《南洋商报》;抗日战争;抗战电影;华侨贡献

[摘要] 论文通过对《南洋商报》刊载抗战电影传播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梳理了自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新加坡沦陷这段时间内,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过程、接受程度及产生的深刻影响。结果显示,在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期间,一批优秀中国抗战电影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新加坡本地出版的《南洋商报》刊载的相关抗战电影信息,生动纪录了这一段时间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历程。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鲜明呈现了中华民族海内外同胞同仇敌忾、全民族投身抗战的时代景观,同时也积极肯定了华侨对中国抗战胜利所做的历史贡献。

[中图分类号] J943.11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2-5162(2016)04-0075-07

The Spread of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Movies in Singapore ——A Case Study of *Nanyang Siang Pau*

XU Wen-ming TANG Li-juan

(Shanghai Film Institute, Shanghai University, Shanghai 200072, China)

Key words: Overseas Chinese;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movies; Singapore; *Nanyang Siang Pau*

Abstract: This paper is focused on the spread of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movies in Singapore from 1937 to 1942. Through the study and analysis of the relevant anti-Japanese war movie texts published in the *Nanyang Siang Pau*, it looks into a series of significant issues in overseas Chinese studies including the introduction, reception and influence of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movie in Singapore and relationship between propaganda and patriotism among overseas Chinese communities. The paper evaluates the impact of Chinese anti-Japanese war movie in Singapore and the historical contribution of overseas Chinese to the victory of China's anti-Japanese war.

1931—1945年间中国抗日战争影片的制作和传播,不仅局限于中国本土,还扩散到了新加坡等南洋地区,在广大华侨海外聚居区产生了重要影响。近年来,针对中国抗战影片的制作和海外传播问题,一些学者展开了若干研究。有学者将抗战电影传播置于抗战电影生产与传播的特定时代环境中,简要分析了抗战电影的海外传播和影响。如虞吉所著的《大后方电影史》一书聚焦抗战时期大后方电影的制作与传播,宏观分析了大后方抗战电影的海外发行情况。^[1]史博公、林吉安的研究以

[收稿日期] 2016-09-01; [修回日期] 2016-11-08

[作者简介] 徐文明(1975—),男,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副教授,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亚洲电影;唐丽娟(1991—),女,上海大学上海电影学院2014级电影学硕士研究生,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电影史。

* 本文为2016年度上海大学电影学高峰学科成果。

抗战时期国统区的电影创作为主要分析对象，认为战时中国倡导的“电影抗战”、“电影下乡，电影入伍，电影出国”等理念推动了中国抗战电影的制作与海外传播实践。^[2]也有一些学者相对具体地以专题形式整理和分析中国抗战电影的海外传播格局。如杨燕、徐成兵在其研究中系统整理了《中制出品国外发行一览表》和《中制出品赠送国外放映一览表》等资料，较清晰地梳理了中制制作抗战电影的海外传播概况。^[3]李子君关于抗战电影海外传播的论文聚焦抗战电影海外传播的地域、方式和影响等问题，相对具体地分析了抗战时期中国抗战电影的海外传播状况。^[4]

总体来说，近年来学者对中国抗战电影的海外传播问题给予了一定关注，取得了一些成果，但针对中国抗战电影区域性、国别性海外传播的个案研究还较为欠缺，对作为中国抗战电影重要海外传播区域的新加坡更是未予以足够关注。针对此种情况，本文立足抗战时期新加坡最具影响力的报纸《南洋商报》，通过对《南洋商报》刊载抗战电影传播史料的整理和分析，梳理自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新加坡沦陷这段时间内，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过程、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接受及产生的深刻影响，并以此透视和呈现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的时代文化景观。

一、不可阻挡的存在：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引入及抗战爱国宣传

1931年中国局部抗战爆发以后，中国制作了一批反映中国人民抗日斗争的纪录片和故事片。远在南洋新加坡的华侨对祖国遭受的苦难与蹂躏给予高度关注。他们迫切希望了解祖国军民抗战的最新动态，希冀自己能够融入抗战，为抗日贡献自己的力量。抗战爆发之初，因南洋地区许多国家仍处于被殖民统治的地位，西方殖民统治者出于殖民统治管理和维护自身利益需要，对中国抗战电影采取较严格的审查管理，致使中国最早一批抗战电影在南洋地区处境艰难。1933年，新加坡《南洋商报》曾载文称：“当中日战事发生时，上海各制片公司曾各冒着险，于枪林弹雨中，摄取战地新闻片，可是这种片到英属来，无一可得准映。”^[5]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后，随着国际时局的变化，讲述中国抗战风云的纪录片、故事片在南洋的处境得以改善，但仍有许多纪录片受到严格审查，遭到禁映。根据1939年新加坡《南洋商报》的报道，在1938年10月1日至12月31日期间，新加坡电影片检查司共检查禁映了16部影片。而在被禁的16部影片中，直接讲述中国抗战风云的影片就达10部之多。这些影片被禁的理由主要有两类：一是被认定为“宣传”，新中国公司制作的《抗战纪实》、四路军摄影社出品的《南武新闻》、香港国防电影社拍摄的《平型关》、香港国际公司的《抗日战争九月后》因“宣传”的理由被禁映；二是被认定为“政治”，大中国影片公司的《和平之真相》、《抗战漫画》、《抗战新闻》、《保卫土地》、《抗战新闻片》、《抗战歌咏集》皆因“政治”理由被禁映。^[6]

尽管如此，广大华侨观众对中国抗战电影怀有热切期待，加之新加坡电影发行公司的不懈努力，经过与殖民统治者的博弈，还是有一大批中国抗战电影以顽强的生命力，突破电影检查的封锁进入新加坡。

（一）抗战故事片在新加坡的引进

在中国抗战影片引进新加坡的过程中，以邵仁枚、邵逸夫为代表的邵氏兄弟扮演了重要角色。邵氏兄弟自20世纪20年代即在新加坡从事电影发行放映，邵氏兄弟公司所具有的上海、新加坡双重背景，浓缩了广大新加坡侨胞的跨地性文化身份特质。抗战全面爆发后，由邵仁枚、邵逸夫主掌的邵氏兄弟公司成为抗战电影进入新加坡的重要力量。1938年，邵氏兄弟公司引进了国防影片《壮志凌云》，这部由上海新华影业公司出品、反映中国北方农民奋起反抗入侵者的影片，受到邵氏兄弟公司的重视，公司为该片进行了精心的宣传，影片正式公映前，邵氏兄弟诚邀新加坡文化界人士前往观看试映，邵氏兄弟公司还在《南洋商报》上发布招待新加坡文化界试映《壮志凌云》的启事，明确表达了支持民族抗战的决心。该启事称：“敝公司因鉴国难当头，欲尽力中华民族构成员救亡之责，最近特不惜巨资，购买上海新华影片公司出品意识正确之国防电影《壮志凌云》影片一部，藉

以激发侨胞，查是片内容救亡煽动性十分强烈，竟蒙本坡验片局丝毫不剪予以通过，是刻为要求本坡文化界对是片之正确批评，於二月廿七日（星期日）上午十时在皇宫戏院先行招待文化界人士试映。”^[7]

1938年，由中央军事委员会监制、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的影片《热血忠魂》被引进新加坡，该片在新加坡受到较高重视，1938年7月11日《南洋商报晚报》用整版篇幅刊登该片多幅剧照。影片引进新加坡后，电影引进方和出品方做了大量广告，影片出品方中国电影制片厂在报纸广告中介绍了该厂在“八·一三”后的电影生产状况，并大力推介《热血忠魂》的不俗价值。其广告称：“中国电影制片厂于‘八·一三’后，即着手拍摄抗战影片，先后完成四部抗战特辑，五部抗战标语卡通，两部抗战歌集，及一切新闻和一部花去一年半的时间所拍摄的《热血忠魂》，概以实地战场作背景……剧情写敌寇之种种奸淫杀掠，我志士之弃家效国，以血肉守御河山，英烈悲壮令人声泪俱下，为抗战影片中之一部杰出，亦为一部较有意义的宣传作品，全部紧张有令人血液怒沸之慨。”^[8]

1939年，联华影业公司出品的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进入新加坡公映，影片的寓言性话语表达，受到新加坡评论界的重视。此后，有越来越多的抗战故事片进入新加坡。1941年，中国影业联营公司总经理罗明佑亲自携带故事片《白云故乡》赴新加坡。该片于1941年除夕夜在新加坡公映，新加坡华侨伴随《白云故乡》讲述的抗战故事度过了1941年新春，影片的广州、香港背景，华侨青年回国服务之悲壮事迹，都让新加坡观众产生了深刻的文化共鸣。1941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影片《火的洗礼》被中国影业联营公司引进新加坡，经罗明佑精心策划，影片被安排在当年7月7日公映，成为新加坡民众纪念七·七抗战爆发四周年的重要活动。

（二）抗战新闻、纪录片在新加坡的传播

不仅抗战故事片受到新加坡观众的欢迎，抗战新闻、纪录电影等具有强烈实录色彩的影片也受到新加坡电影商和观众的青睐。邵氏兄弟公司作为抗战影片引进新加坡的主力，曾引进不少抗战纪录影片，其中，邵氏兄弟公司在1938年引进了由中国青年摄影社赴陕甘宁边区拍摄的抗战实录电影《中国救亡军》。该片聚焦中国共产党在陕甘宁地区的抗日斗争生活，对于前线勇士与抗大男女员生参加救亡工作之实际历况，描述甚详，“其中尤以毛泽东氏及诸八路军军政重要人员英姿之影□^①，最为可贵，军队之苦干情况，抗大学员之坚忍努力，更令视者兴无限之振奋，诚抗战期中一不可多得之现实写作也云。”^[9]通过该片，在陕甘宁地区领导中国人民抗日的毛泽东等中国共产党人及抗日军政大学、延安鲁艺生活等内容呈现于新加坡电影观众面前，让新加坡观众了解了陕甘宁地区抗日军民生活的状况。

除通过银幕呈现中国共产党领导的陕甘宁地区抗日斗争生活外，中国其他区域的抗日战争重要事件也通过纪录片被介绍给新加坡华侨观众。其中，1938年7月，中央摄影场出品的《台儿庄大血战》（邵氏兄弟公司引进）和中国电影制片厂的影片《台儿庄歼灭战》先后在新加坡公映。这两部作品皆聚焦中国抗战中取得的台儿庄大捷，电影公司为两部影片做了热情宣传。邵氏兄弟公司在为《台儿庄大血战》所做的宣传中如是描述：“战事实录影片，是粉碎暴敌侵略迷梦，创百年来最大胜仗之台儿庄血战，亦即我们中华民族最光荣的战绩。”^[10]通过纪录片的影像，台儿庄战役作为抗战期间中国军队取得的重大胜利被广大新加坡华侨所熟知。

此后，又有大批纪录片进入新加坡。其中，中央电影摄影场出品的抗战影片《抗战中国》被远东影业公司引进新加坡。《抗战中国》被冠以“最伟大最壮烈抗战实录巨片”，在新加坡展开了强力宣传，进行了大规模放映。《抗战中国》于1938年10月被引进新加坡，这部影片1938年10月25日在新加坡首映时，南侨总会主席陈嘉庚携该会常务委员兼财务主任李振殿等人亲往观看该片，“陈氏

① 本文引文中出现的“□”，均表示该文字模糊不清，无法辨认。

对于片中表现之抗战事实，深致好评”^[11]。陈嘉庚在南洋拥有极高的社会声望，他对《抗战中国》的好评，此后不断出现在该片的宣传活动中，这部影片在新加坡及整个南洋地区获得广泛关注，观众纷纷前往观看该片。

1940年，新加坡中华影片公司发行中央摄影场出品的《保卫中华》新闻片，该片于1940年3月15日下午三时假座小坡光华戏院试映，影片讲述广西军队、后方难童教养等内容，“在在均足以表现中华民族艰苦卓绝之伟大精神，尤其广西省女军人，出发前线，共同杀敌，英气凛然，而林主席出巡粤桂湘赣诸省，为各地官民热烈欢迎，及蒋委员长广播国民精神总动员等训词，其场面均甚伟大云。”^[12]

除电影公司层面的影片引入和影界从业者携带影片赴新加坡外，1938—1942年，也有经由民间团体携片前来传播抗战风云的方式。1940年8月，带有民间性质的中国回教南洋访问团赴南洋访问。中央政府借此难得机会，委托其携带影片南下宣传抗日。此次南洋访问团带到新加坡的有纪录片《胜利的前奏》及《黄自遗作》等作品。这些影片抵达新加坡后，先在新加坡小坡同乐戏院放映了半夜场，随后在新加坡进行广泛放映，受到新加坡华侨的欢迎。

二、爱国的能量：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接受及深刻影响

1937—1942年，进入新加坡的抗战影片在银幕上搭建了一个抗日宣传的阵地。它们一方面向新加坡华侨展示了祖国人民抗击侵略者的浴血历程，另一方面也承载了新加坡华侨全力支持中国抗战的拳拳赤子爱国热情。

（一）市场反馈：新加坡华侨观众对抗战电影鼎力支持

总体来说，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获得了观众的鼎力支持与欢迎。战后，当人们回顾抗战时期华侨观众的观影选择时，华侨对抗战电影的巨大热情和无私支持被反复提及。20世纪50年代有人著文这样表述：“当时海外华侨热心救国，对于抗战宣传的影片热烈拥护。”^[13]20世纪80年代，新加坡资深影人林文治在回顾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受到的欢迎程度时，也曾如是称：“七七事变，中国开始对日抗战，华侨敌忾同仇，凡有上映抗战影片，都非常卖座。”^[14]

而从新加坡电影放映的历史发展过程来看，抗战电影受到的热烈欢迎还一度改变了新加坡电影放映市场的格局。1938年，中国电影制片厂出品的故事片《热血忠魂》进入新加坡放映，电影引进公司为强力推广该片，除在中西报纸发布广告、为新加坡华侨学校提供价格优惠外，还协商当地专放西片的影院——水仙门大马路首都戏院，请求该院抽出一天时间首映该片，结果，该片在首都戏院首映日的前三场4500个座位被华侨学校抢订一空。最终，《热血忠魂》在首都戏院首映当天连映五场，场场满座，观众达7000余人，总计收入达3000元，不仅影片首映当晚“院前人山人海，抢购戏票迫到召警维持秩序，黑市票涨价一倍”^[15]，而且全日卖座成绩破西片《泰山》最高纪录。院方即晚宣布第二天用小坡同乐戏院无限期续映该片，“中国片就此走进全星马一流西片院”^[16]。《热血忠魂》的成功开启了中国影片进入星马一流西片电影院的序幕。此后，1939年4月，国防电影《狼山喋血记》在新加坡也获得观众关注，首映日虽逢雨天，但公映影片的四家影院仍一齐满座，“足见其号召威力，诚属非常，而此间同胞对祖国之关怀，亦可见一斑。”^[17]

抗战纪录片在新加坡也频创市场佳绩。1939年抗战纪录片《抗战中国》在新加坡首都、光华、东方、环球、光荣、大西洋、皇后七大戏院接连公映，再创市场热潮。“不独舆论予以热烈推荐，观众之拥挤，更为任何抗战纪录片所未见。”^[18]该片在首都大戏院首映时，“上午售出之票，已达百数十元，下午络绎不绝购票者，尤为众多，未几五角及一元之票，均已售罄，由此可见侨胞对祖国关心殷切矣。”^[19]无独有偶，描写陕北抗日军政大学及延安八路军生活风貌的《中国救亡军》在新加坡放映时，也受到观众欢迎：“每晚观众，殊形踊跃。”^[20]

（二）凝聚与激励：国家意识、身份认同与全民抗战的精神总动员

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传播过程中，来自祖国的抗战风云在银幕上进行传播，新加坡华侨的国

家意识和民族意识得到强化。中国抗战电影成为凝聚与激励华侨群体、推进全民抗战的精神总动员的重要载体。

在抗战电影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国家意识成为抗战电影宣传的重要元素。首先，国家民族意识在国防电影宣传和讨论中得到反复强化。1937年以后，伴随抗战影片在新加坡的放映，国防电影观念深入人心。《壮志凌云》、《太平洋风云》、《狼山喋血记》等国防电影在新加坡公映时，新加坡的主流媒体和影评人发表了一批关于国防电影的宣传与评介文章。在影评和宣传文章中，许多作者都突出了中国抗日战争的合法性和必要性，将国家民族与国防意识在文本中加以强化。如1938年《壮志凌云》在新加坡公映时，《南洋商报》发布的新闻直陈：“由于我们民族的敌人不断地向我们民族蚕食，不断地破坏我们的国家组织，造成我们民族的绝大危机，于是国防电影应运而生。”^[21]

新加坡电影观众也积极投入到国防电影的传播活动中。1938年，新加坡皇宫戏院举行竞选国防冠军片活动，经过观众投票，吴永刚导演的《壮志凌云》获得初次票选冠军，侯曜导演的《太平洋风云》获得亚军，影片《龙城虎将》获得第三名。通过此次观众票选和宣传活动，国防电影的观念更加深入人心。

其次，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国家遭受的苦难及中华民族不畏强暴、坚信抗战必胜的乐观主义情绪也得到强化。这种态度和价值表达倾向在抗战纪录片、抗战新闻片的传播中体现得尤为明显。影片《焦土抗战》的宣传强调中华民族抵抗日本侵略的坚强决心：“全国民族下最大牺牲的决心，宁为玉碎，不为瓦全，以焦土抗战之政策与敌作殊死争斗，生死存亡，成败利钝，一切都在此一举。”^[22]“宁愿焦土抗战，决不屈服退让！拼全民族生命与流血，扑灭敌寇侵略火焰，收复失地！”^[23]1940年新加坡公映纪录片《抗战续辑》的宣传，着力突出中国抗战的艰辛与取得伟大胜利的振奋人心：“长沙外围血战，湘北胜利捷报。千百篇的血债交织成这部中华战场抗战实录！千百处的故乡，出现了这一部纪录祖国抗战必胜的巨制！千百万的同胞，把血泪凝成可歌可泣的史诗！”^[24]

在电影评论中，抗战电影的国家意识与全民抗战的精神总动员特质得到凸显。1938年，影片《热血忠魂》在新加坡放映过程中，还随片放映了副片《万里长城》和卡通片《满江红》。电影评论者对《万里长城》进行了如下评介：“《万里长城》这个副片是由实地摄取而来的，悠扬的歌声，展开了一幅明媚而秀丽的图画，大好的农村，翠绿的山河，使人悠默而思，愤然而感，试看今日之城中，竟是谁家之天下？”^[25]评论者不乏悲愤的文字引导观众对国土沦亡的现实进行思考。

1940年《中华儿女》在新加坡公映后，有评论者通过分析剧情，强调中华民族反抗日本侵略的必要性和合法性，该文如是写道：“在恬静而瑰丽的置景下，写出了安份农民的勤于耕耘，然而，敌铁蹄的践踏，使他不能安分守己，老母，爱妻，双双地死于敌军侮辱之下，这使得他咆哮如雷，忽而加入游击队，这个故事，叫人意识的感悟到倘要生存，就不得不抛下锄头，拿起枪杆上前线去。”^[26]影片《热血忠魂》公映后，有评论者同样从影片故事得出中华民族抵抗侵略必胜的结论：《热血忠魂》“是中华民族抗战中的一支生力军……它告诉我们，不怕敌人的残酷与疯狂，我们有的是热血，可以阻止敌人。”^[27]

显然，抗战影片在新加坡的传播和接受过程中，“中华民族”、“全民族抗战”等是被反复提及的概念，“全民族”的概念被一再提及，显然有着激励和动员新加坡华侨确立身份认同的重要意义。通过“中华民族”这一共同体概念，南洋华侨和饱受蹂躏的祖国建立起了密不可分的血肉联系，而广大华侨的“中国人身份”也由此得到强化。抗战电影的宣传、放映和观摩，将广大华侨和祖国联接成一个稳定的命运共同体。事实上，抗战影片在新加坡的传播实践过程中，此类“中华民族”、“中国人”的共同身份意识成为反复强调的话语表述模式。如《抗战中国》的广告称：“每个中国人，都要来看！不看此片，枉为中国人！……。本片给你看到：祖国的——锦绣河山，抗战的——严肃气氛。使君身历其境，好似返了唐山。带你的父母，宗地姊妹妻子儿女亲戚朋友一道来。”^[28]1940年在新加坡公映的《华南大会战》，其广告除明确定位“华南会战是消灭敌人力量至重且巨的一役！是最有

活力包括无遗的一部战片”，同时也明确宣称：“凡我国人，不可不看。”^[29]

1940年在新加坡放映的故事片《中华儿女》，则在广告宣传中突出剧中人物和观众的血肉联系：“四万万五千万中华儿女在抗战中的觉醒，剧中人物，也许是你我的朋友！也许是你我的亲戚！也许是你我的家庭！也许就是我自己！抗战期内中华儿女血肉构成可歌可泣英勇热烈的故事！”^[30] 1941年1月25日《白云故乡》发布广告，号召全体新加坡华侨观众共同行动：“明晚本坡侨胞一致动员，往‘首都’齐集，共贺春节来临，并视今年抗战胜利也。”^[31]

（三）多方位支持抗战：电影放映、募捐活动与青年教育

除对华侨群体进行精神激励外，中国抗战电影也成为华侨群体和电影放映机构募集抗战资金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1937—1942年，新加坡电影放映机构和华侨群体利用电影放映，积极组织电影放映募捐活动，使电影放映成为华侨为抗战募集资金、支持抗战活动的重要组成部分。例如，1938年《热血忠魂》在新加坡首都大戏院放映时，片方将首映日20%的收入捐助救济中国难民。此次影片放映共助赈中国难民计叻币五百九十四元三角五占，款项被直接交给新加坡筹赈会。1940年11月，回教南洋访问团从祖国带来《胜利的前奏》一片，该片被新加坡兴华筹赈会用来举行义映活动，义映所得收入悉数充救济祖国难童用途。该活动在宣传中如是称：“诸君今晚出钱目的乃为救济祖国难童，而祖国难童，乃为敌人所做成者，盖自敌人侵我土地，毁我房舍，许多快乐乡村，快乐家庭，因而流离失所，许多儿童无家可归。”^[32]利用电影放映进行的资金募集活动，得到广大华侨的热情支持，他们通过观影助赈展现自己的爱心和支持抗战的热情，表达了自己对祖国的深厚情感。

抗战电影不仅为抗战救济提供资金募集支持，还被用来作为教育、引导青年华侨的重要方式。抗战电影被用来培养和动员抗战的有生力量。其中，积极采取各种手段，吸引和支持青年学生观看抗战电影，成为新加坡许多电影放映机构的共同选择。当时，在放映抗战影片时，许多放映机构为青年学生提供了票价优惠，以吸引他们观看抗战影片。如《抗战中国》在新加坡放映时“为使学生界能普遍观看起见，特于日场只收半价，以示优待办法，凡学校社团均可享受”^[33]。《白云故乡》在新加坡放映时也采取优待学生界的做法，影院方在1941年2月1日和2月2日“首都”戏院开设早场，以2角半的票价优待学生观看。通过观看抗战影片等宣传活动，新加坡青年华侨的抗战热情被点燃，有许多青年毅然回国，投身全民族抗日战争的时代洪流。

三、结语

从1937年中国抗战全面爆发至1942年2月15日日军占领新加坡为止，虽然受制于当时新加坡英属殖民地身份等因素，若干优秀中国抗战电影最终无缘在新加坡放映，但是仍有一批优秀中国抗战电影漂洋过海来到新加坡。新加坡本地出版的《南洋商报》刊载的相关抗战电影信息，生动纪录了这一段时间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历程。总体来说，此时进入新加坡的中国抗战电影成为华侨了解祖国抗战风云、表达抗战热情的重要渠道。1937—1942年中国抗战电影在新加坡的传播，鲜明呈现了中华民族海内外同胞同仇敌忾、全民族投身抗战的时代景观，也鲜明呈现出新加坡华侨的强烈爱国情怀。正如2011年9月18日中国驻新加坡使馆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6周年暨“九·一八”事变80周年电影招待会上，中国驻新加坡大使魏苇先生所说：“同为日本法西斯战争受害者的新加坡人民给予了中国人民宝贵的支持。当时的中华总商会、怡和轩、南洋华侨筹赈祖国难民总会等机构以及众多的个人积极奔走呼吁，为中国抗战提供了巨大的物质和精神支持。中国政府和人民将永远铭记他们为中国抗战作出的巨大贡献。”^[34]抗战时期新加坡华侨对抗战电影的热情及对抗战的全力支持，值得后人永远珍视和铭记。

[注释]

- [1] 虞吉:《大后方电影史》,重庆出版社,2015年,第152~153页。
- [2] 史博公、林吉安:《国统区抗战电影述论(1937—1949)》,《电影艺术》2012年第3期。
- [3] 杨燕、徐成兵:《民国时期官营电影发展史》,中国传媒大学出版社,2009年,第170~172页。
- [4] 李一君:《烽火年代的中国形象——中国抗战电影的海外传播与国际银幕上的中国抗战(1937—1945)》,《福建师范大学学报》2016年第3期。
- [5] 佚名:《星洲影界鳞爪》,《南洋商报》1933年11月19日。
- [6] 佚名:《去年最后三个月本坡禁映之影片》,《南洋商报》1939年1月21日。
- [7] 邵氏兄弟公司:《邵氏兄弟公司招待本坡文化界试映〈壮志凌云〉启事》,《南洋商报》1938年2月25日。
- [8] 中国电影制片厂:《热血忠魂》广告,《南洋商报》1938年8月25日。
- [9] [20] 佚名:《〈中国救亡军〉影片每晚观众殊形踊跃》,《南洋商报》1938年11月17日。
- [10] 大光、华英戏院:《台儿庄大血战》广告,《南洋商报》1938年7月3日。
- [11] 佚名:《抗战中国影片,昨晚四场皆满座》,《南洋商报》1939年10月26日。
- [12] 佚名:《〈保卫中华〉昨试映表现中华民族伟大精神》,《南洋商报》1940年3月16日。
- [13] 易水:《国片的发行工作》,《南洋商报》1959年4月20日。
- [14] [15] [16] 林文治:《华片打入西片影院》,《联合早报》1983年4月24日。
- [17] 佚名:《〈狼山喋血记〉,该片昨晚首映,四院一齐满座》,《南洋商报》1938年4月8日。
- [18] 远东影业公司:《请侨胞注意〈抗战中国〉重再审查已获通过》,《南洋商报》1939年11月28日。
- [19] 佚名:《〈抗战中国〉影片昨夜放映观众拥挤》,《南洋商报》1939年10月22日。
- [20] 佚名:《〈中国救亡军〉影片每晚观众殊形踊跃》,《南洋商报》1938年11月17日。
- [21] 佚名:《国防电影〈壮志凌云〉今晚放映,题材为保护大农村》,《南洋商报》1938年3月2日。
- [22] 佚名:《〈焦土抗战〉行将公映》,《南洋商报》1938年1月8日。
- [23] 东方、大西洋、华侨戏院:《焦土抗战》广告,《南洋商报》1938年1月14日。
- [24] 皇宫戏院、大光戏院:《抗战续辑》广告,《南洋商报》1940年3月16日。
- [25] 罗一亭:《〈热血忠魂〉讲话》,《南洋商报》1938年9月4日。
- [26] 陈载道:《抗战之声〈中华儿女〉观后话》,《南洋商报》1940年5月26日。
- [27] 哲山:《祖国电影的一部灿烂光荣的新贡献——〈热血忠魂〉》,《南洋商报》1938年8月14日。
- [28] 佚名:《抗战中国》广告,《南洋商报》1939年10月23日。
- [29] 华英戏院、曼舞罗戏院:《华南大会战》广告,《南洋商报》1940年8月8日。
- [30] 佚名:《中华儿女》广告,《南洋商报》1940年5月19日。
- [31] 佚名:《〈白云故乡〉明晚映演首都半夜场》,《南洋商报》1941年1月25日。
- [32] 佚名:《兄弟愿将一点感想以告诸君》,《南洋商报》1940年11月26日。
- [33] 佚名:《〈抗战中国〉影片今日正式公映,在水仙门首都戏院》,《南洋商报》1939年10月25日。
- [34] 《驻新加坡使馆举行纪念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66周年暨“九·一八”事变80周年电影招待会》, http://news.ifeng.com/gundong/detail_2011_09/19/9293667_0.shtml, 2016年9月12日浏览。

[责任编辑: 胡修雷]